砺剑壮歌塑精魂

——火箭军“砺剑文艺轻骑队”探索为兵服务新模式

■张 蕾

一路放歌，一路调研，一路创作。盛夏时节，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“砺剑文艺轻骑队”一行18人，历时10天，深入8个旅团开展为兵服务活动，共演出8场，举办“战友面对面”活动2场，发放调查问卷千余份。他们在了解官兵文化需求、创新轻骑队服务内容和模式、创作军旅文艺精品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和思考。

面向基层，精准对接需求

“背了一天歌词，上台没捞上唱，我要求返场再唱一首，找回歌手的‘尊严’。”歌手王玮玮说，在某导弹旅演唱《带你去旅行》时，上台献花的4名战士“抢”了她的话筒，她只好打着节拍唱完整首歌。

王玮玮介绍，以前下部队演出时，递话筒给战士们都不一定有人唱。现在这些战士多为1998、1999、2000年出生，个性张扬，热情活跃，具备较高的音乐素养。

这次演出，轻骑队组织了一支年轻队伍，平均年龄27岁，大部分队员与官兵是同龄人，生活习惯和审美相似，听着一样的歌，用着一样的APP。因此，节目单上增加很多流行时尚元素。当年轻队员报上《悟空》《小幸运》《我们不一样》等歌时，最初并不被看好，结果音乐响起，引发全场大合唱，2小时演出嗨爆全场。文工团团长周炜感慨：“演出队伍气质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而且台下火箭军官兵嗷嗷叫的状态，像冲击波一样，让人无法抗拒。”

这支不一样的队伍里，除了文工团队员，还有5名基层文艺骨干，都是战士评选出来的“文艺之星”，其中有营连职干部，也有士官，他们战斗、生活在一线，对部队非常熟悉。不同背景的队员互融互通，互相学习，互相促进。

人员年轻化、曲目时尚化拉近了与基层官兵的距离，演出场地同样离官兵更近。驻训场上，临时舞台两边就是巨大的导弹发射车，歌唱演员金波站在发射车上唱起《有咱就有发言权》，豪情万丈；当地文化广场上，轻骑队队员、基层官兵与村民一起联欢，热情的群众燃起篝火拉着他们跳起彝族舞步，久久不愿散场。

2017年3月，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组建“砺剑文艺轻骑队”，长期活跃在驻训场，受到官兵热烈欢迎。部队文艺工作者以为兵服务为宗旨，首先就要了解基层官兵真实需求，为此，轻骑队特意设计《为兵服务调查问卷》在演出现场发放，开场即宣布观众是主人、是评委，表演结束后回收问卷。问卷有11个问题，包括本场演出最喜欢的节目、最喜欢的演员、对文工团演出的评价和建议等。

90后舞蹈演员李繁，在第一场演出后以2/3的票数成为最受欢迎演员。得知结果的她当场落泪，又惊喜又意外，没想到一个舞蹈演员能让那么多战士记住名字。有一名战士喜欢90后舞蹈演员牛牧源，在问卷的每一栏都写上了他的名字。李繁和牛牧源共同参演的即兴舞蹈“5+1”，获评最受欢迎节目。

问卷显示，基层官兵想看具有较高专业性、有一定规模的演出；喜爱歌曲、舞蹈等具有创新形式的综艺类节目，还有人想看脱口秀；喜欢流行时尚、轻松热烈的节目风格；希望一年看到文工团演出两次以上。

这就是官兵的心声，是基层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。做好为兵服务工作，就要精准对接需求。

自我更新，创新服务模式

“这场节目单全换，不能让官兵看一样的节目。”当周炜了解到部队不久前驻训时看过文工团的演出，立即提出更换节目单。

现在，火箭军部队演训任务多，拉动频繁，部队在外驻训时文工团常到现场演出。只有保持大量节目储备，才能保证常演常新。他们一路排练新节目，一个节目单只演一场，及时进行自我更新。

一边演出，一边调研，一边服务。轻骑队变单纯慰问演出为多种文化服务相结合的新模式，既有联欢演出，也有座谈交流，还有文化设施保障维护。在“战友面对面”活动中，他们以战友的身份，约上技术骨干、大学生士兵、一线带兵人、即将退伍的老兵，说说心里话。一名新兵问道：“如何看待形式主义的问题，怎么做一个真人？”周炜与战士交流自己的感悟：“不管做什么工作，多关注下面，就能克服形式主义。”这样的面对面活动，和官兵一起畅谈人生感悟，聊从军岁月的小纠结、小困惑，探讨社会热点话题，不仅是文艺工作调研，也是心理疏导。

作为军营文化建设的一部分，一线部队的硬件设施接受了轻骑队演出的检验。音响、灯光、舞美直接影响节目质量，设施符合专业演出的需求，演出才能达到最佳效果。每到一个旅团，轻骑队两名经验丰富、技术精湛的灯光师、音响师立即投入舞台设施的布设。他们带着部队文保中心骨干，排查故障，检修设备，传授维护经验，对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提出专业意见。

除了到基层演出，火箭军文工团还探索“伴随式保障，嵌入式服务”模式。军队文艺和军事行动结合，文艺分队作为政工组文化要素，嵌入到实战演练之中。王玮玮和徐成瑶曾在驻训场和部队一起生活、训练一个月，在训练场的帐篷里给官兵演出、创作节目，不仅鼓舞了士气，也锻炼了自己。王玮玮经历一系列表演和互动，了解到《我们不一样》《小幸运》非常受欢迎，于是在节目单上增加了这些歌曲。徐成瑶对部队有了更深的认识，能熟练掌握导弹发射专业术语。这一切都有助于提升他们为兵服务的水平。

轻骑队将他们的经验总结为“四字真经”：轻、准、活、融。轻，装备轻，人员少；准，精准服务，知道官兵需求；活，鲜活，即兴互动；融，融入官兵的情感和生活。每到一地，先了解部队基本情况和先进事迹，并将其融入节目。一次为驻训官兵演出时，周炜现场采访，连夜创作相声《战地之最》，广受欢迎。

文化要素伴随军事行动，文艺战士真正融入部队。正如周炜所说：“如果把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比作鱼，部队的一切就是那一汪清水，没有这清水，鱼是无法存活的。”

引领风尚，打磨精品力作

“《导弹女兵》伴随我5年军营生活，现在即将退伍，想和芳芳姐再唱一次，为军旅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。”听说节目单上没有《导弹女兵》，1994年出生的女兵丁黄蓉强烈要求加上。《导弹女兵》是民歌演员郭芳芳的代表作品，几乎每场都唱，这次为了有新鲜感，轻骑队编排节目时将其排除。没想到有6名女兵主动要求和郭芳芳合唱，其中丁黄蓉、王伟琪曾参与MV的拍摄，她们希望把歌曲的情感传递给舞台下的女兵们，鼓励她们继续坚守岗位。

经典歌曲记录个人成长，总是百听不厌。金波的代表歌曲《班长的红玫瑰》和《有咱就有发言权》，在战士点歌时总会被点到，每场必唱，因为歌曲贴近兵的生活，体现火箭军特色。

军队文艺创作，还要符合当下审美需求，用官兵喜欢的表达方式传递强军兴军理念。郭芳芳入团时和基层战士年龄差不多，8年过去，她成了战士眼中的大姐姐，也在不断思考下一步的创作问题：“相对板正的民族唱法，在审美上离官兵越来越远，必须做一些改变。”金波在考虑如何掌握流行时尚元素：“创作出比《小幸运》还要受欢迎的歌曲。”

迎合时代审美，把握时代特色，只是跟上了脚步。在表达和传递感情的同时，还应引领风尚。

8场演出，最受欢迎的节目是“5+1”，即5名男演员加上1名女演员，利用一顶迷彩帽创编的军旅题材舞蹈。主持人介绍6名舞蹈演员时，演员分别向观众展示不同的舞种，民间舞、当代舞、芭蕾舞等，让官兵对此有基本认知，并拉近与官兵的距离，懂得欣赏接下来的舞蹈。表演包括3段内容：“童趣”，几个孩子抢军帽，表达了从军的愿望；“恋爱”，与军人相恋，聚少离多；“母亲”，面对儿子牺牲，母亲悲痛不已。这段即兴创意舞蹈有笑、有泪，感动现场官兵。接下来，他们将继续挖掘，将这个节目扩展为舞剧。

轻骑队瞄准基层需求，创新服务模式，最重要的还是要创作更多军旅文艺精品，丰富官兵文化生活，满足文化需求，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。

文化多元时代，军旅题材作品要引领风尚，需加大主旋律精品创作力度，为部队鼓与呼，既反映官兵心声，又具备时代感和流行特色。好的作品不仅要得到官兵的认可和欢迎，还要通过传媒推介，让大众知道，让社会认同。为兵服务，最终将依靠文艺精品落到实处。

文化视界

烈士的后人

■李献如

传家风 立家训

父亲在世时，对我反复叮嘱：“一定要把咱家的‘传家宝’保存好，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，要堂堂正正地做人，做有用的人，不给这个‘传家宝’抹黑！”

父亲所说的“传家宝”，是两张烈士证明书：第一张证明书是县委于1955年12月18日发给我们家的，上面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道：

查李尼的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，丰功伟绩永垂不朽……

第二张证明书是国家民政部于2011年9月12日签发的，上面写道：

李泥的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牺牲，被评定为烈士。特发此证，以资褒扬。

这两张证书中提到的两个名字，一个是“李尼的”，另一个是“李泥的”，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人——我的爷爷。

爷爷生前没有正式的大名，只有小名。抗战初期，他入伍到八路军129师，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，因作战勇敢，多次立功，于1946年光荣入党。在一次战斗中，爷爷冲在了最前面，不幸牺牲，年仅30岁。爷爷牺牲时，父亲只有7岁，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，扛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总是给我们讲战争年代的故事，讲爷爷英勇战斗的故事。年年月月沐浴在这样的故事里，我们这个普通农家渐渐形成一股崇尚军人、向往英雄的风气。

我姑姑成年后，长得俊，勤劳能干，来家里说亲的人络绎不绝。姑姑很有主见，选择了远在石家庄元氏县服役的姑夫。20世纪80年代，表姐出嫁，表姐夫也是一名军人。

1998年春天，我结识了在西藏服役的丈夫曹灵国。第一次见面后，我决定非他不嫁。岂料，几位闺蜜并不赞同我的选择，她们说：“现在是市场经济，嫁给军人就意味着吃苦受罪，凭你的条件，绝对可以找一个更好的，过上吃穿都不愁的日子……”父亲知道情况后，完全支持我的决定：“咱家和军队有缘，和军人有缘！”

有了父亲的支持，我和边关的他走得更近了。我知道，我的血脉里早已融入军人的基因。

1999年夏天，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婚后，我以一名军嫂的身份，跟随丈夫第一次踏上雪域高原。军营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是那么神圣，飘扬的五星红旗、嘹亮的军歌、整齐的步伐、庄严的军姿，还有远处的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。因为高原空气稀薄，我的身体出现严重不适，仅在部队停留20天便匆匆返回内地。

从此，我们开始了夫妻两地分居生活。丈夫一年才有一次探亲假，所以家中事务只能靠自己操持。

那时，我孕期反应很厉害，每天呕吐不止，日渐消瘦。无数个宁静的夜晚，我独自躺在床上，透过窗户遥望天上闪烁的星星，心里牵挂着远在天边的丈夫，在站岗吗，下雪了吗，想家了吗，冷吗……

尽管已做好吃苦的准备，但现实远远超过我的想象，襁褓中的女儿经常感冒发烧，抱着女儿来回奔波在去药店和医院的路上，是常有的事。一次，女儿在凌晨2点左右发高烧，上吐下泻，眼睛紧闭，我抱着女儿，握着手电筒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飞奔，泪水溅湿了衣裳。那个时刻，多么希望一个温暖有力的声音响在耳边：“别担心，有我在！”可是，漆黑深邃的夜，只有沙沙的风声、雨声。

欣慰的是，丈夫在部队干得很好，服役12年，4次被评为优秀士兵，一次荣立三等功，一次被评为优秀党员。每当立功喜报寄回家乡，各级领导同志总会把喜报精心装裱，敲锣打鼓送到家中。那一刻，再多的苦累都会化作幸福的笑。那是一名普通军嫂的笑。

如今，丈夫转业数年。他总是说：“有国才有家，若有战，召必回！”我为丈夫的情怀感动。我觉得，这是一名军人的血性、一名军人的坚守。他的军旅情结，他的无悔青春，我懂！

转业后的丈夫并不寂寞，他在微信里关注了多个军媒公众号，时常和姑夫、表姐夫聚在一起，捧着我家的“传家宝”，回忆爷爷的英雄事迹，回忆他们火热的军旅生涯，关注部队的建设与发展。每当看到军队建设取得新成就时，他们总会击掌相庆，唱起军歌。

看着他们活得那么精神，毫不庸俗，我和姑姑、表姐打心眼儿里高兴。作为军嫂，作为烈士的后人，我们和他们一样，扛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凝集起一种铿锵激越的家风。

眼下，又逢征兵时节，我的外甥晓勇决定报名参军。晓勇在今年的高考中成绩优异，总分625分。这孩子挥着拳头说：“先参军，再读大学。若不参军，终生遗憾！”

我那11岁的儿子时常穿上爸爸的那身旧军装，行走在村里的石板路上。他举着拳头对伙伴们说：“我长大了也要去西藏，当个和爸爸一样优秀的军人！同志们，冲啊……”

看到儿子身上涌动着那股小英雄气概，我笑了，眼眶一下子湿润起来。爷爷和父亲若有知，定会欣慰万分吧？

东溪古镇（油画） 朱志斌作

铸剑更需书香伴

■晏 良

古往今来，我国就有武将写诗、士卒好学的传统，读书向来是帐中一景，历久弥新。

铸剑更需书香伴，笔下常见跨征鞍。悠悠岁月，漫漫征程，华夏历史上爆发过的战争难以统计，但战火孕育的著名将领却童叟尽知。孙武、岳飞、辛弃疾、戚继光等先贤，就读书破万卷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古代军人挑灯伏案，写下的诗词多是帐前即景，那些描述晓行夜宿、大漠孤烟的凄美时光，以及纵横沙场、保卫山河的悲壮场面，都展现出“书剑合璧”的力量。

从历史硝烟中走来，作为军人理应保持练兵备战豪情，亦应承袭沙场读书雅性。身处知识决定眼界、信息主导头脑的今天，习武和读书同样重要，因为前者可以强身塑能，后者能够健脑善谋。一支不注重读书增智的军队，无疑只会在使蛮力、掰腕子的低层次徘徊。要想如虎添翼、转型换羽，离不开书香墨迹的浸染。古时打仗，不仅武官熟读兵法，主将身边还常带谋士，足见他们对书本之喜、对文化之依。当前，强军兴军进入关键阶段，我们更应拿出学生“赶考”的态度来读书，使自己成为问不倒、难不住的“学者型”军人。

野外练兵日，亦是读书时。在浩瀚沙场，军人的主要任务是打仗，但训练间隙和调休之际，我们同样可以借着帐前明灯读书，做到既与装备为伍，又和书本为伴。一位儒将做过形象比喻：枪和书不仅是他的两个无言战友，还是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。这话道出沙场读书的重要性。学贵恒毅，滴水穿石。三国时期的东吴大将吕蒙，虽然迟悟读书与用兵之关联，但他在30岁左右奋起直追，日积月累，后来读的书超过了宿儒耆旧。吕蒙的后知后觉启示我们，起点虽晚不影响冲刺，练兵再忙亦有读书之机，书山有路学无止境，书剑同耕才能春华秋实！

当然，在野外沙场阅读，不一定要博览群书。贪吃嚼不烂，兼收难并蓄。我们应当讲究阅读方法，做到有所侧重、善于取舍。比如，多读一点“含军量”高的书籍，以此提升自己的信息化素养；又如，多读一点诠释牺牲奉献情怀的书籍，以此修正自己的精忠报国视角；还如，多读一点体现战斗精神的书籍，以此砥砺自己的血性和虎气……总之，要免读风花雪月、男欢女爱，少一些酸文假酷、浅唱低吟，坚守高格调、主旋律、正能量。只要用好利于练兵备战、益于陶冶情操、助于成长进步的“精神食粮”，便能铸剑有术。

亲爱的战友，野外驻训的大幕已经掀开，莫忘出征专门带上书籍，到点即建野战书吧，途中组织读书演讲……希望战斗文化结出硕果，期待胜利之师捷报频传。

热风冷眼

我爱军装绿

■艾立起

42年前，一纸大红色的入伍通知书，使我从一个农家子弟变成一名解放军战士。从此，我的人生与人民军队紧紧连在一起。

我打小就崇拜解放军，钟爱绿军装。这种情怀伴随我走过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时代。终于，机会来了。1975年11月的一天上午，作为初中毕业班语文教师的我，敲完上课钟，手拿试卷正要向教室走去，突然被村里一名民兵干部叫住：“立起，今天公社征兵目测（即初级体检），你去不去？你家是中农，全公社也摊不上一个中农指标，估计你也没啥希望。”我喜出望外：“去，当然去。”于是，我把考试的事托付给校长，直奔公社卫生院参加目测体检。

到了那里，刚填完登记表，我就被一位接兵干部“缠住”了。他问这问那，并许诺：“只要你身体没啥大问题，我就带你走。”越向往参军，越担心自己某些方面不合格。我毫无保留地向接兵干部暴露“缺陷”：“我有虫子牙（龋齿）。”“这又不传染，不影响当兵。”“我家是中农。”“今年我们部队可以接一个中农出身的，就是你了。”

转眼到了1976年1月13日，担任民兵连长的本家大叔还劝我：“立起，你还年轻，今年先让你二叔（连长的弟弟，比我大两岁）走，你要是想当兵，明年、后年都还有机会。”但第二天，入伍通知书就发下来了，大叔说：“人家接兵的就看上你是高中毕业生了，说啥也不让换人。”

崭新的绿军装发下来后，我用手，不，简直是用心抚摸她、感知她，多年的企盼如愿以偿。

我们那时都熟悉这样一首歌《我爱我的称呼美》。歌中唱道：“我爱领章红，日夜放光辉。我爱军装绿，染得山河翠。”42年间，我两次入伍，两次转业，皆围绕这身绿军装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。

1986年，我在区武装部工作，在百万大裁军中，首次面临转业选择。当时可选的路有两条：一是转业到地方工作，二是留在武装部，当没有军籍的“兵”。那时，我毅然选择留下，因为那是离绿军装最近的地方。

10年之后的1996年，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。那时我是正科级干部，如果留地方，最低也能安排一个实职副科的岗位；若回到部队，再转业时将与排职干部一样安置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回部队，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我所钟爱的绿军装。

2001年，我第二次转业时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既然我的大半生都交给了部队，既然我的生命中再也离不开军装，干脆我就一条道走到底，还是选择与军装相关的工作单位。这样，我到市国防教育办公室报到上班了。

“咱当兵的人，有啥不一样？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。”——这是歌声。

咱当了大半辈子兵的人，有啥不一样？只因为我心里永远依恋绿色的军装——这是心声。

一瓣心香